

《文心雕龍·論說》與現代學術論文的撰寫原理

黃維樑

提 要：受到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中華學者從事研究後撰寫學術論文，都以西方學術論文（thesis，academic article，academic paper）的撰寫原理和規格體例為模式。這樣做自有其學理的根據、建制的理由。《文心雕龍·論說》對“論”體的規範和現代學術論文的撰寫原理，翕然相通。〈論說〉篇指出，“論”乃“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此即現代學術論文的要求：綜合、分析各種相關資料、說法後達成一個結論。〈論說〉篇認為優秀的“論”，必須“師心獨見，鋒穎精密”，這就像現代學術論文重視獨創的見解、精確的表達力、嚴密的邏輯性一樣。〈論說〉篇還論“說”體，認為其特色在說服人，在使人“悅”服。現代學術論文固然論證嚴密且筆調嚴肅，但也有另類，如錢鍾書的現代學術論文就有奇色，是“論”“說（悅）”的合璧。〈論說〉篇對表“巧”實“妄”的論文加以責難，而當前學術界正有這類“學術論文”，學者應引以為戒。二十世紀西方的各種文學理論繽紛多元，自有其價值，學者自可採用。中華學者在以西方為馬首之際，應該回顧東方的龍頭——一筆豐厚的文論遺產，並擇其精當者而用之、發揚之。

關鍵詞：《文心雕龍》；《文心雕龍·論說》；文體；現代學術論文

一、引言：論文・treatise・thesis

論文一詞的涵義帶有相當的學術性、嚴肅性，大約相當於英文的 treatise。如果要強調此詞的學術意涵，可加上 academic 一詞而成為 academic treatise。

tise，即學術論文。大學裏的學生（包括碩士生博士生）研究某一課題，撰寫論文，以符合學位的要求，這論文稱為 thesis；如果與博士學位相關，則或稱為 dissertation^①。這些論文都稱為學位論文或學術論文。在大學裏教書，或從事學術研究的專家學者，撰寫論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通常稱為 article 或 paper；為了強調學術的意涵，又可稱為 academic article 或 academic paper。這些當然也是學術論文。規模宏大、歷史悠久的“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其出版的論文寫作規範性手冊，用以指稱學術論文的，則是 research paper 一詞^②。無論如何，上述的幾個英文詞語，用字有異，而意義則差不多：指的都是從事學術研究後寫成的議論性文章。因為研究者、撰寫者都在學術建制（establishment）之內，所以學術論文在體例上、形式上有其相當的規範。

二十世紀西方各國強大先進，西方文化是強勢文化。中國及其他東方國家，莫不受到西方文化影響。中國的教育、學術種種典章制度，都相當西化，或者說現代化。現代學術論文是學術建制的一部份，中華學者撰寫學術論文，一切以西方模式為範式，是順理成章甚至是理所當然的事。以西式為範式的現代學術論文，自然有其學理的根據，有其建制的理由；中華學者為了與國際學術界接軌，遵照現代學術論文的撰寫原理和體例格式，完全無可厚非。不過，如果有人認為現代學術論文是西方先進文化獨有的、優越的文體，“落後”的中國傳統文化缺乏這種文體，中華學者只得謙卑地接受和模

^① 關於這幾個英文名詞的解釋，可參考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及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 7th ed.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等。

^② *The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2003 edition) 用了 research paper 一詞。

仿這西方的恩物，那就大謬不然了。^③

關於文體，吳承學指出：

在中國古代，“文體”一詞，內容相當豐富，既指文學體裁，也指不同體制、樣式的作品所具有的某種相對穩定的獨特風貌，是文學體裁自身的一種規定性。^④

所言甚是。中國古代的文體，類別繁多。《典論·論文》分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8體，〈文賦〉則有10體：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至《文心雕龍》，其“論文敘筆”21篇，共有35體。後來吳訥的《文章辨體》、徐師曾的《文體明辨》，更多至59體和127體。中國古代文體的分類，實在是個複雜的問題。本文不討論這個問題；為了論述的方便，本文依從現代西方的說法。

根據現代西方的一般做法，我們把文學分為四個類型（genre）：詩、散文、小說、戲劇。散文有抒情（expressive）、寫景（descriptive）、敘事

③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寫作於1907年）呼籲國人“求新聲於異邦”；他又鼓吹“拿來主義”。當時的很多知識分子都向西方取經。胡適鄙棄絕句、律詩，鼓吹西方的自由詩體；魯迅本人向果戈理等借鑒寫作小說；戲劇界則捨棄傳統戲曲，“拿來”文明戲。在文學理論方面，王國維受叔本華啟示，撰寫其〈紅樓夢評論〉；聞一多受佛洛依德影響，研究唐詩。文學理論界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從臺灣到香港然後到改革開放的大陸，兩岸三地幾乎成為西方文學理論的殖民地。中國文學的學者，比較追趕潮流的，無不大用特用西方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來做研究。大家或對馬克斯主義馬首是瞻，或對心理分析學心嚮往之，或對佛萊（Northrop Frye）崇拜如對佛祖，或與結構主義結了不解之緣，或對女性主義頂禮如對聖母或聖女；到了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流行的時候，中華學者便都成為“後學”，見賢思齊唯恐不及。一位學者感慨地說：“在一些所謂的學術交流中，西方學者總是擔當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爺角色，而在國人面前本為‘博導’、‘名流’的教授，卻立馬扮演着小學生，提一些謙虛得幼稚的問題。”筆者就曾親見親聞一位“博導”因看不明白庫恩（Thomas Kuhn）的範式理論而公開表示困惑，以至不知其研究何去何從。崇洋也就罷了，還抑華：指責中國古代文論以至中國人的思辯方式不科學。“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西洋人擅於思辯和分類，中國人則否；服膺王國維及其《人間詞話》的葉嘉瑩則說：西方人擅於“科學推理”，中國人反之。近年的某些論調如出一轍，有“古代文論沒有現成的理論體系”、中國文化從“周易開始就是模糊的”等說。（真不知道“國學大師”及其後學的古書是怎樣讀的；《禮記》《管子》《呂氏春秋》《史記》《文心雕龍》《閒情偶寄》等書沒有思辯、科學推理、分類、體系？）西方有一位漢學家，也說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語言是用典故的、用比喻的”；“批評家極愛用關鍵詞，同時對界定這些詞語的問題幾乎全無興趣”；中國古代極少“全面的、完整的理論著作”。有這樣的幫腔，也可說是幫兇，中國古代文論要被判極刑了。抑華而崇洋，這樣的過度西化令人嘆息。

④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322。

(narrative)、論說 (expository) 四種性能。我們可據其性能把散文分為抒情散文、寫景散文、敘事散文、論說散文四個次類型。現代學術論文屬於論說散文。中國一千五百年前的文學理論傑構《文心雕龍》，體大慮周，有近半的篇幅論述各種文體，其〈論說〉篇論的正是論說散文。中西文化就其異者而觀之，有迥異說，有大異小同說；就其同者而觀之，則有相同說，有大同小異說。錢鍾書論述中西文化，曰：“東海西海，心理攸同。”^⑤筆者服膺其說，且引申補充之：東海西海，文理不異。《文心雕龍·論說》所述“論”（論文）的撰寫原理，與現代學術論文的要求，並無二致。

二、“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

先引《文心雕龍·論說》的前半篇，即討論“論”體的部份，如下：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墮。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于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

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于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

^⑤ 見錢氏《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的序言。

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銳思于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于有無之域；并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系于形用；貴無者，專守于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讖世》，頗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究于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責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廷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文公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

首先，請注意“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這一句。牟世金的語體譯文是（為了讓非《文心雕龍》專家也能了解劉勰的理論，本文在必要時提供原文的語體翻譯）：“對各種說法加以綜合研究，從而深入地探討某一道理。”^⑥這一句中，又請先注意“研精一理”四個字。研就是研究，正是現代學術界說的做 research。研究得有個焦點，有個主題；研究之後，得到一個結論，說出一個道理。“研精一理”的“理”，就是 thesis。這上文出現過的 thesis 一詞有二義：一是大學裏學生（包括碩士生博士生）經過研究後寫成的學術論文；二是有根有據、符合邏輯地加以論證得出來的論點、觀點。把兩個解釋合而觀之，即學術論文必須有一個中心論點，有劉勰所說的一個

⑥ 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註》（山東：齊魯書社，1996）。下文引述牟氏的語體譯文，都根據這本書，不再一一註明。

“理”。大學教授指導學生撰寫學術論文，強調其論文必須有一個主張、一個論點。例如，美國聖雲州立大學的一份教材就這樣說：“社會安全與老年”可以是一篇學術論文的題目，卻不能作為它的論點；而“社會安全制度經常有變動，人要明智地計劃退休後的生活，是幾乎不可能的”則可以^⑦。劉勰推崇嵇康的〈聲無哀樂論〉一文，這篇論文很清楚地有一個論點，有一個嵇康說的“理”，就是聲音本身沒有哀和樂的分別。

學術論文的論點不能憑空而來，不能由作者信口開河而得，乃必須通過對種種資料、說法的理解、分析、歸納、判斷才能獲致，這就是劉勰說的“彌綸群言”。現代學術論文的一般體例，包括列出一份參考書目（bibliography）。這份參考書目表示作者做研究時參考過的文獻，表示作者並非閉門造車，並非“思而不學”。現代學術論文在文首還往往來一節“文獻探討”，先介紹前賢和時人在相關論題的種種研究成果和說法；下文才展開討論，然後提出作者本人的意見。在一篇教人撰寫學術論文的文章中，作者說：“學術論文不是簡單地說出作者的觀點而已；比這更重要的，是表達他人已有的成果；這些成果，和作者經過一番研究後得到的合乎邏輯的意見一併寫出來。”^⑧從大學裏研究生的論文，到資深教授發表在學報上的論文，都要這樣：要“彌綸群言”，即“對各種說法加以綜合研究”。

三、“師心獨見，鋒穎精密”

〈論說〉篇解釋“論”這種文體的性質後，舉出傅嘏、王粲、嵇康等人的幾篇論文，稱讚它們“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論之英也”。這裏請先注意“師心獨見”四個字。“師心獨見”就是觀點獨到，就是有創見、有新意。研究生花幾年功夫讀學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後寫出來的論文，當然不能只是資料的羅列，當然必須有新的發現，有學術上的收穫，即英文所謂的 new discoveries，所謂的 findings。已建立學術地位的學者，繼續“窮

^⑦ 見 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 網頁的 Write Place and LEO。

^⑧ 見 KGSupport : English language document review and editing specialists 網頁的 “Tips on Writing an Academic Paper”。

經”，以至成為“皓首”，其辛勤研究後寫成的論文，當然必須有創見，有新意，否則寫來何用。設審稿制度的學報，其編輯請專家審評文稿，審評表上列出來的項目，第一個通常是：“請問送審的這篇論文是否有創見？”譬如一篇《楚辭》、《紅樓夢》或者荷馬史詩、莎士比亞悲劇的論文，相關的論著有成千上萬種，如果作者只是東抄西引前人的說法，完全沒有自己的論點，那麼，這篇東西怎能稱得上是論文？劉勰在〈論說〉篇讚美了“論之英”者，他也毫不客氣地指出，“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而沒有價值。

接着請注意“師心獨見”後面的“鋒穎精密”四個字。論文有創見是好的，但先要看是什麼“創見”，要看是否真的是中肯可信的創見。如果所謂的創見只是偏見、謬論，是譁眾取寵的狂妄之言，則這篇論文不要也罷。劉勰認為好的論文，筆鋒要銳利（“鋒穎”），敢破敢立，其立論則要嚴謹精密，否則獲致的結論必不能使讀者折服。對於“精密”的要求，〈論說〉篇有下面的補充：“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牟世金這樣譯為語體：“必須做到思想和道理統一，把論點組織嚴密，沒有漏洞；文辭和思想密切結合，使論敵無懈可擊。”這就是現代學術論文要求的嚴謹的邏輯推理了。美國大學教授編著的學術論文寫作指引一類書，無不強調學術論文行文的邏輯性^⑨。“精密”說也和〈論說〉篇較早講的“義貴圓通”說相互發明。〈論說〉篇兼論“註釋”，這是“論”的一個分支，劉勰舉了毛亨、孔安國等人的幾種著述，說他們“要約明暢，可為式矣。”“註釋”是“論”的分支，其寫作原理與“論”相同（“總會是同”）；換言之，“論”的語言風格是“要約明暢”。在一本“介紹當今國內外文體學研究領域前沿理論”的《文體學概論》中，編著者指出：科技文體（包括學術論文）“的文體特點是：清晰、準確、精練、嚴密”^⑩。這和

⑨ 如註⑧“Tips on Writing an Academic Paper”即強調立論的邏輯性（logical）；Harvard University 網頁的 The Writing Center 亦然，見其“Developing a Thesis”一節。

⑩ 劉世生、朱瑞青，《文體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238。

劉勰對“論”體的寫作要求，是一致的。^⑪

四、“論”“說（悅）”合璧

劉勰論詩、賦時，主張作品情采兼備。《文心雕龍·總術》認為上乘的詩、賦這類美文相當於西方的（*belles-lettres*），其風格是“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對於“論”體，劉勰卻沒有這樣的形容，沒有這樣的要求。上引《文體學概論》一書描述科技文體的特點時指出：這種文體“講究邏輯上的條理清楚和思維上的準確嚴密，不像文學語言那樣充滿感情色彩，而是以一種冷靜而客觀的風格陳述事實和揭示事理”^⑫。劉勰如起於九泉之下，讀到這段說明，一定點頭稱是。不過，《文心雕龍》這本“體大慮周”傑構的作者，應該會接着說：“論”體固然以明暢精密、不帶感情、不求華采為正宗，為正色，卻也有另類，有奇色。

錢鍾書的現代學術論文屬另類，有奇色。錢氏的〈詩可以怨〉、《宋詩選註·序》等篇，旁徵博引，“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當然是現代學術論文。他這些論文在“明暢”說理之際，講究用比喻、用對仗（即《文心雕龍》說的比興和麗辭），文采斐然，與一般現代學術論文的行文平實以至枯燥乏味風格大不相同。例如，〈詩可以怨〉比較司馬遷和鍾嶸對寫作動機的說法，解釋道：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只說“舒憤”而著書作詩，目的是避免姓“名磨滅”、“文采不表於後世”，着眼於作品在作者身後起的作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鍾嶸說：“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強調了作品在作者生時起的作用，能使他和艱辛冷落的生涯妥協相安；換

^⑪ 〈論說〉篇認為“論”體的特徵，還有“辨正然否，窮于有數，究于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等，林家宏《文心雕龍文體論實際批評研究》（碩士論文，臺灣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8年；尚未出版）對此有很好的說明。錢鍾書對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文稱讚有加，以其“匠心獨運”也。劉慶華及林家宏對錢說都有引述，並因此更肯定劉勰對嵇文的評論。劉慶華觀點見其《操斧伐柯論（文心）》（香港：中華書局，2004），130-132。劉氏又指出，嵇文的一些觀點與“儒家相違”，而尊崇儒家的劉勰，仍對嵇文予以高度評價，可見“劉勰的評論是客觀的，不偏於個人的愛憎”（劉著第132頁）。又：安曉陽在涂光社主編的《文心司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一書中有章節論《文心雕龍·論說》，頗有佳見，可參看。

^⑫ 劉世生、朱瑞青，《文體學概論》，238。

句話說，一個人潦倒愁悶，全靠“詩可以怨”，獲得了排遣、慰藉或補償。^⑬

這樣說固然文意清晰暢達，而錢鍾書不滿足於“辭達而已矣”，乃要在這段話之前，先來一句：

同一件東西，司馬遷當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鍾嶸卻認為是活人的止痛藥和安神劑。^⑭

讓讀者眼前一亮，腦海一閃，跟着追讀下文。這好比是作戰時夜空中先放了個照明彈，然後揮軍出擊，直搗黃龍。《宋詩選註·序》的辭采更璨亮，比喻一個接一個，如：

(1) 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彷彿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裏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⑮

(2) 假如宋詩不好，就不用選它，但是選了宋詩並不等於有義務或者權利來把它說成頂好、頂頂好、無雙第一，模仿舊社會裏商店登廣告的方法，害得文學批評裏數得清的幾個讚美字眼兒加班兼職、力竭聲嘶的趕任務。^⑯

還有對仗式語句：

(1) [在宋代]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複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額。^⑰

(2) 偏重形式的古典主義有個流弊：把詩人變得像個寫學位論文的未來碩士博士，“抄書當作詩”，要自己的作品能夠收列在圖書館的書裏，就得先把圖書館的書安放在自己的作品裏。^⑱

《文心雕龍·論說》除了論“論”體之外，還論“說”體。劉勰解釋曰：“說者，悅也；悅為口舌，故言資悅懌。”牟世金這樣譯：“所謂

^⑬ 錢鍾書，《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05。

^⑭ 錢鍾書，《七綴集》，105。

^⑮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

^⑯ 錢鍾書，《宋詩選註》，9。

^⑰ 錢鍾書，《宋詩選註》，1。

^⑱ 錢鍾書，《宋詩選註》，17。

‘說’，就是喜悅。‘說’字從‘兌’，《周易》中的〈兌卦〉象徵口舌，所以說話應該令人喜悅。”“論”“說”是兩體卻合為一篇，原來二者有共通之處。牟世金對〈論說〉篇有這樣的闡釋：

“論”與“說”在後代文體中總稱為“論說文”。本篇所講“論”與“說”也有其共同之處，都是闡明某種道理或主張，但卻是兩種有區別的文體：“論”是論理，重在用嚴密的理論來判斷是非，大多是論證抽象的道理；“說”是使人悅服，除了古代常用口頭上的陳說外，多是針對緊迫的現實問題，用具體的利害關係或生動形象的比喻來說服對方。後世的論說文，基本上是這兩種文體共同特點的發展。

牟氏說明“說”體有“使人悅服”的目的，又說用“生動形象的比喻來說服對方”，洵為知言。用比喻來說明道理，來說服人，正是劉勰之意；他在〈論說〉篇就這樣說：“至于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這使人聯想到古希臘大學者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Rhetoric)一書中，教人演說時用具體生動的言辭、用比喻，以達到說服人的目的。亞氏《修辭學》專注的，正是說服人的藝術(the art of persuasion)。

上面說錢鍾書的現代學術論文是另類，有奇色。由〈論說〉篇之“說”體特色觀之，則錢氏不過以“說”為“論”，在“論”色之外加上了“說”色，增添了文采，不過是“論”“說”合璧而已，其目的在使人“悅讀”後“悅服”。

五、〈辨騷〉、整本《文心雕龍》：學術論文

筆者曾撰文指出《文心雕龍·辨騷》是一篇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的文章^⑩，我們也可稱它為一篇學術論文。〈辨騷〉篇徵引劉安、班固、王逸、漢宣帝、揚雄等各家對《楚辭》的評論，又列舉〈離騷〉等《楚辭》作品以為研究對象，加以綜合析辨，這正是〈論說〉篇說的“彌綸群言”、“研精一理”。劉勰的結論，或者說對《楚辭》的最終評價是：“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把《辨騷》

^⑩ 〈現代實際批評的離形——《文心雕龍·辨騷》今讀〉，收黃著編，《中國古典文論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篇的引述語（quotations）從“撮述式”（撮述大意）變為“全引式”（原文全引），加上三數十個註釋，再加上一份參考書目，然後投寄給大學學報，或者把它譯成英文後投寄給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這篇現代學術論文一定會獲得編輯部的青睞。

《文心雕龍·序志》寫道：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泛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

劉勰“詳觀近代之論文者”，而後有所褒貶。他閱讀歷代的文學作品，加以析評，其意見“有同乎舊談者”，“有異乎前論者”（〈序志〉篇語）。這表示他“彌綸群言”然後加以論斷。“詮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序志〉篇語），而劉勰窮多年之力以“彌綸群言”、“研精一理”。這裏的“一理”為：什麼是文學？什麼是好文學？這就是《文心雕龍》全本書的旨趣。《文心雕龍》無疑是一本學術論文，體大而慮周、高明而中庸的學術論文。憑這本論文，加上引文、註釋、書目等現代學術包裝，劉勰應該得到名牌大學的幾個博士學位——至少是一個攻讀學位得來的博士學位，加上幾個頒贈的榮譽博士學位。

六、東海西海，文理不異

20世紀中外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多所貶抑，中華學者從事文學研究時，多一面倒地只引用西方文論，甚至囫圇吞棗地、“不求甚解”地引用。有識之士，為此而興嘆。如何重新發現中國古代文論的價值，並用於文學作品的研究、批評，應為中國古代文論學者所關心、所致力。筆者認為中國古代文論的龍頭大典《文心雕龍》的理論具備體系性、恆久性、普遍性，極具價值。近年筆者用力於比較《文心雕龍》與西方古今文論，指出其價值所在；並把《文心雕龍》的理論，用於對屈原、范仲淹、余光中、白先勇、莎士比

亞、王爾德、馬丁·路德·金等詩、文、小說的實際批評，還用於對韓劇《大長今》的評論、對德國“漢學家”顧彬的批駁。筆者所應用的《文心雕龍》理論，包括“六觀”“鎔裁”“比興”“麗辭”“知音”“詭巧”等等。筆者又指出，《文心雕龍》的〈史傳〉、〈時序〉篇，對文學史的撰寫，極具指導意義。^②

本文則指出《文心雕龍·論說》的理論，完全符合現代學術論文的撰寫原理，誠然可以古為今用。其可用之處，上文已一一說明。這裏再補充一點。劉勰一方面稱讚優秀的論文，一方面則責難其差劣者。〈論說〉篇這樣批評後者：“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牟世金的譯為：“巧於文辭的人，違反正理而勉強把道理說通，文辭上看起來雖然巧妙，但檢查實際情形，就會發現是虛妄的。”這個評語用於當代的某些“學術論文”，十分貼切。十餘年前發生於美國學術界的索卡爾惡作劇（Sokal Hoax），正是一面“巧”而“妄”的西洋鏡。當代研究文學的眾多學者，無論西方、東方，都主義掛帥，撰寫的“論文”，五花八門充斥、八門主義連篇，因為如此這般，才算高深，才趕上潮流。紐約大學的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有人把姓氏戲譯為騷哥）教授編導了一齣表“巧”實“妄”的惡作劇，令人震驚。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位教授痛心於學術界的歪風，乃炮製了一篇冗長、艱澀、術語和引文充斥的“學術論文”，投給著名學報《社會文本》（Social Text），蒙其編委及匿名評審袞袞諸公“青睞”審查通過，予以發表。發表之日，騷哥預先寫好的惡作劇式事件本末聲明也公佈了。原來其“大作”弄虛作假、胡說八道，一大堆的術語、一大串的徵引，都不過是裝腔作勢、眩人耳目而已。七寶樓臺，拆卸下來，不成片段，而且材料多是贗

^② 筆者近年所撰關於《文心雕龍》的論文有：〈以《文心雕龍》為基礎建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委心逐辭，辭溺者傷亂——從《文心雕龍·熔裁》論《離騷》的結構〉、〈中華文化“春來風景異”——用《文心雕龍》六觀法析范仲淹《漁家傲》〉、〈“重新發現中國古代文化的作用”：用《文心雕龍》“六觀”法析評白先勇的《骨灰》〉、〈余光中的“文心雕龍”〉、〈讓雕龍成為飛龍——《文心雕龍》理論“用於今”“用於洋”舉隅〉、〈炳耀仁孝，悅豫雅麗——用《文心雕龍》理論析評韓劇《大長今》〉、〈請劉勰來評論顧彬——《文心雕龍》“古為今用”一例〉、〈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文心雕龍·時序》〉、〈《文心雕龍》和香港文學史的撰寫〉等十多篇，可參看。

品。“論文”和聲明一發表，美國的學術界為之騷動^②。騷哥此“論文”，是名副其實的西洋鏡，他自行拆穿；東方的學者，能不借此西洋鏡為戒嗎？“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這條“龍”的作者，早就警諭過這類表巧實妄的“論文”了。

二十世紀西方的各種文學理論繽紛多元，自有其價值；文學研究者採用之，頗有收穫。然而，“東海西海，心理攸同”；東海西海，文理不異。高明而中庸、體大而慮周的《文心雕龍》，實在具有恆久而普遍的理論價值。《文心雕龍》的理論視野，自然不包括二十世紀源於西方的多種理論，如心理分析學，如女性主義，如後殖民主義；它對文學的種種論述，卻無疑具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意義。〈論說〉篇的“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等說，和現代學術論文的撰寫原理，翕然相通。中華學者在學術文化方面，以西方為馬首之際，應該回顧東方的龍頭——一筆豐厚的文論遺產，並擇其精當者而用之、發揚之。

(黃維樑 臺灣宜蘭 臺灣佛光大學)

② 蔡仲等譯的《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一書，即述論此事。臺灣也出版了關於這事件的專著。香港學者李天命對這類艱難而實訛亂的“論文”極為反感，他用了“學混”一詞來指稱某一類的學者：“廣義文科(人文社科)方面的學混，尤其是哲學、社會學、教育學、藝文批評、文化研究等等領域裏的學混，有下列特徵：(a)語意曖昧……(b)言辭空廢……(c)術語蒙混……(d)隨波逐流……。”參見李著，〈哲學衰微哲道生〉，《明報月刊》2003年8月號：48-56。艱難文論之風，在海峽兩岸三地的文學學術界吹了多年，頗為猛烈。正在哀文論多艱之際，筆者讀到美國文論界老將布扶(Wayne Booth)的一封書信，精神為之一爽。布扶越洋飛來的是一封公開信，題為〈致所有關心文學批評前途的人〉。信函刊登在2004年冬季號的《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布扶長期任教於詩家谷(Chicago)大學，後為該校榮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他趁美國文論界群英谷中論劍之際，發表此函，筆鋒所及，我相信已刺痛刺傷了當代不少名家及新秀，乃至刺出了日後一些文壇恩怨。在公開信中，他謙稱自己是老笨蛋。這個老笨蛋和它相熟的一些老讀者，讀着時下《批評探索》的眾多文章，全然摸不着邊際，被嚇跑了。布扶常常擲卷興嘆。太息之餘，他苦苦勸告《批評探索》的編委：你們“不能完全看懂的論文，就不要發表，即使論文作者是名家”。有艱難的文論，乃有艱難的論文。讀者讀不懂，文論和論文，雖多亦奚以為？難怪布扶公開信發表之日，也是《批評探索》主辦的座談會舉辦之時，引來了《紐約時報》的貶抑性報道：“最新的理論就是理論沒有用”。